

市井新声

市井新声

96.1.12

市井新聲

龍門叢書

三言二拍：
人性复归的呼唤

魏崇新

市井新声

市井新声

龍門叢書

市井新聲

魏崇新

三言二拍：人性复归的呼唤

[晋]新登字 3 号

责任编辑 李 健

封面设计 金 星

市 井 新 声

——三言二拍：人性的复归

魏崇新

*

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太原井州北路 11 号）

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闻喜县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5 字数：107 千字

1994 年 1 月第 1 版 1994 年 1 月山西第 1 次印刷

印数：1—1200 册

*

ISBN 7—5440—0185—7
G·186 定价：3.50 元

总 序

沿着文化史和文学史的双轨，我们启动机车，向龙门进发。

黄河东来决昆仑，咆哮万里触龙门！

龙门，神州之形胜；

龙门，中国文化之门；

龙门，开凿混沌的象征；

龙门，开放发展的印证！

五千年的中华传统文化辉煌而又沉重、它的精魂在文学的形象中载沉载浮。传统文学不是苍白的幽灵，而是鲜活的生命，它在现代人的交流、对话中获得启生。

作为民族感情的升华，作为民族精神的闪光，作为民族灵魂的动作，作为现实的文化背景，作为民族存在的根据，我们试图揭示中国传统文学的生命底蕴。在某种意义上，我们也是在以丛书的形式对“重写中国文学史”的时代呼声作出一种回应。如果根据周易的原理，将文学分为艺术及思想内容层，个性心理意识层，群体心理意识层，民族及人性心理意识层等四个不同层次，那么我们现在更着意于探索其深层的“动静”，沟通历史与现实，通过昨天的反思，认识今天的形象。审美说到底是一种生命存在和体验的方式，对民族审美体验的结晶物——文学的重新品味也就是民族生命的认同和更新。

龙门是神秘的，龙门是幽邃的，龙门是开敞的。我们将深入，再走出，然后跳过！

我们曾经都是鱼，我们将成龙，还将在见前不见尾的腾挪变幻中向无际的天宇作永恒的追寻。

《龙门丛书》编委会

引言

人创造了文明，改造着自身，同时文明又以种种文化规范制约着自然人性的发展，造成了人类文明史上文化与自然、压抑与抗争的不断冲突，从而推动了人类历史的进程。在中国古代文化史上曾不时地同响着要求挣脱束缚，寻求人性解放的呼声，春秋战国的理性精神，狂放玄远的魏晋风度，晚明放荡无忌的世俗情趣，形成了中国古代文化史上人性解放的三部曲，对中国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天道远，人道迩”，春秋战国的理性精神是人挣脱了天帝神权的精神枷锁后对自身价值的确认，人性从原始宗教的漫漫长夜中苏醒过来，人们把探发的目光从天上转移到自身，感觉到人作为存在的真实与伟大，从而开始对人性、天人关系、社会政治道德等一系列问题的哲学思考，带来了百家争鸣的激动人心的历史场面，为中国的传统文化奠定了基础。魏晋文人的个性解放是对两汉以来臧纬神学与虚伪礼教的反动，时代的动荡与礼教的倾颓使人们体悟到生命的可贵与自由的重要，促发了人的觉醒。“礼法岂为我设？”“情之所钟，正在吾辈”，“排汤武而薄孔”，“情”与“礼”的冲突正是这一时代精神的体现。纵酒佯狂，放达风流，玷污礼教，成为人追求自由反抗社会的外在表现形式，先秦的理性精神不仅

得到进一步发展，而且被灌注进新的感性内容，人的价值重新得到肯定。

历史的车轮迈进十六世纪，古老的华夏大地上又掀起了第三次人性解放思潮。随着哲学的变异和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市民阶层崛起，市民意识增强，促发了一场个性解放浪潮。“率性而为，是为真人”，人的个性得到空前认可，好货好色，人的自然欲求得到社会的肯定，人性冲决理学禁欲主义的罗网，开始向自我回归，“情”与“理”的冲突成为时代思想的焦点。思想上的离经叛道，生活的上的放纵奢侈，文艺上的异调新声，形成一股以市民意识为代表的汹涌世俗洪流，揭开了中国文化史上新的一页。如果说，春秋战国是以哲学臣子为代表的人的理性意识的觉醒，魏晋是以文人士大夫为代表的人的生命自由意志的发现，那么，晚明则是以市民（包括市民文人）为代表的世俗人性的复归。马克思说：“任何一种解放都是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人自己”。（《论犹太人》）中国的三次人性解放也是如此。

作为晚明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三言”“二拍”“极摹人情世态之歧，备写悲欢离合之致”，以对现实生活生动逼真的描绘，为市井细民写心，真实反映出市民阶层的思想与人生价值观，再现出时代的精神风貌。“三言”“二拍”所蕴含的思想内涵是丰富而复杂的，在这本小册子里，我们不想对其进行全方位的文化透视，而是想从“人的发现”这一主题入手，对其所反映的晚明社会的文化心理进行解剖，从一侧面揭示晚明人性解放的轨迹。我们认为；“三言”“二拍”作为一部晚明社会心灵的历史，它所展示的是人性挣脱桎梏走出中世纪的历程，可以说它是一部中国十六世纪的“人曲”。

目 录

总序	(1)
引言	(1)
启蒙：人的觉醒	(1)
程朱理学的衰落与思想的解放	(1)
市民意识的觉醒	(8)
十六世纪中国的人曲	(13)
追求：发迹史与白日梦	(19)
人生价值观念的变化	(19)
经商发财的白日梦	(26)
发迹变态中的市井心态	(32)
沉迷：爱情婚姻的悲喜剧	(38)
“以男女之真情，发名教之伪药”	(38)
婚爱的悲剧：模式与意义	(48)
“婚姻也只自商量”：女性意识的觉醒	(58)
放纵：走出人性的禁区	(67)

灵与肉：被分割的两极	(67)
爱与欲：新的综合	(73)
放纵与堕落：人性的畸变	(80)
反讽：宗教的世俗化	(86)
人性与神性的较量	(86)
遮掩在袈裟下的贪欲	(93)
世俗社会的宗教幻想曲	(99)
困惑：道德的悖论	(108)
义与利的蜕变	(108)
理与欲的冲突	(113)
天人报应的矛盾内涵	(121)
比较：两个不同的世界	(130)
共同的支点：对中世纪禁欲主义的反叛	(130)
相异的精神：伦理与自然	(143)

启蒙：人的觉醒

程朱理学的衰落与思想的解放

哲学是时代思想的灵魂，思想启蒙与个性解放无不以哲学的变异为前奏，作为晚明启蒙思潮先导的是产生于明代中叶的王阳明心学。

王阳明心学的出现是有其时代契机的，它是对明初独尊程朱理学的反动。明初朱元璋为巩固皇权统治，政治上实行绝对的中央集权专制，思想上独崇程朱理学，朱熹将儒学神圣化，视封建纲常为万古不变的天理，朱元璋则将朱学神圣化，极力抬高朱熹的地位，使朱学在明初盛极一时。“世之治举业者，以《四书》为先务，视《六经》为可缓。以言《诗》，非朱子之传又弗敢道也；以言《礼》，非朱子之家礼弗敢行也；推是而言，《尚书》、《春秋》，非朱子所授，则朱子所与也；言不合朱子，率鸣鼓而攻之”。（朱彝尊《道传录序》）明初思想上述程朱，僵化腐呆，缺乏创造性；行为上恪守封建伦常，亦步亦趋，失去独立的人格；生活上循规蹈矩，谨小慎微，不敢越雷池一步。“情”被“理”扼杀，人性在“天理”的禁锢中发出痛苦的呻吟，失去活泼的灵气。然而，

有压抑就有反抗，有禁锢就有突破。到了成化、弘治、正德年间，明代政治开始衰败，统治者的荒淫腐败，宦官干政的昭彰劣迹，土地兼并的激烈，使国运日蹙，作为官方统治思想的儒学——程朱理学也日渐失去维系人心的作用，引起了人们的不满与怀疑；最终，人们把社会的衰败归结为人心不正。抛弃宋学，另求治国救民的新义成为社会心理的潜在需求，王阳明生逢其时，心学也应运而生。

其时，作为封建纲常伦理基础的程朱理学已变为僵硬的教条，不仅无助于封建纲常的施行，反而成为封建纲常沦丧的催化剂。王阳明敏锐地觉察到这一点，认为只有打破僵硬的理学教条，才能解决时代思想的危机，挽救封建纲常的颓运；于是他在不违背儒学原则的基础上对儒学进行了改良。王阳明不满于程朱理学以外在之理的本体，偏重于超感性现实的先验论偏失，转而强调以人的一己之心为本体，主张心即是理，“心外无理”，“心外无物”，而天理只是人心的映象，使心之本体摆脱了天理的束缚，具有更大的自主性与能动性。他说：“人者，天地万物之心也。心者，天地万物之主也。心即天，言心则天地万物皆举之矣”。（《答季明德》）人是天地万物的中心，人心是衡量天地万物的标尺，用人心取代了天理，启发了人的主体意识。王阳明主张“学贵得于心”，认为“求之于心而非也，虽其言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而况其未及孔子者乎？求之于心而是也，虽其言出于庸常，不敢以为非也，而况其先于孔子者乎？”《传习录·答罗整庵少宰书》以心作为裁判是非的标准。不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不以《六经》之说为标准，不管王阳明的主观意图如何，这种观点不仅强调了人的自我意识，而且已经到了离经叛道的边缘，产

生了冲击圣经贤传的客观效果，为晚明李贽等人所掀起的非孔反儒思潮打开了缺口。

程朱理学将儒学神圣化，王阳明则将儒学世俗化。王学的重心在于探索圣人与个人之间的关系，王阳明认为“良知”是人皆有之的，在具备“良知”上俗人与圣人没有不同，圣与愚的区别只在于圣人能达到“致良知”的境界，而愚人则不能。如果愚夫愚妇能够“致良知”，也能达到成圣的境界。因此他说：“与愚夫愚妇同的，是谓同德；与愚夫愚妇异的，是谓异端”。（《传习录》下）承认良知的个别性，以世俗百姓作为衡量是非正邪的标准，这种理论中孕育着突破封建等级及道德的因素，为晚期普通人参与实现儒家理想的市民群众运动开辟了道路。

当然，王阳明倡导心学并不想反对封建纲常，而是为了更好地维护封建纲常，他的“良知”与朱熹的“天理”同样指的是封建伦理，只不过朱熹把封建纲常外在权威化，把它强加于人，在社会实践中完全抹杀了人的主体能动作用。而王阳明的“良知”则把封建纲常从外面拉回到人的内心，变为人的内在自觉性，从而说明封建纲常的实际可行性，以及道德实践的必要性。但王阳明心学在客观上突出了人在道德实践中的主观能动性，提高了人自身的价值作用，促发了人自我意识的觉醒。七窍一凿，混沌遂亡，王阳明对传统儒学的改良引起了人们对儒学的怀疑，使王学取代了朱学在明代思想界的地位，并且王学理论被晚明思想家发挥利用后，就成为冲击理学与封建纲常的有力武器，形成一场声势浩大的启蒙运动，这大约是王阳明所始料不及的。

如果把传统儒学看作中国古代的国家宗教，那么，王阳

明对传统儒学的改造则有似于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马丁·路德与王阳明生活于同一时代，他因不满于中世纪基督教神学而对其教义进行改革，把基督教世俗化、人情化。路德认为人只要心存信仰，就不必求助于教皇和教会，也不必求助于圣教礼仪，而只要向自己的良知呼吁，就能达到自我救赎。他把上帝从神秘的彼岸召回人的心中，引发了一场西方的人文革命。王阳明改造传统儒学，把儒教世俗化，提出了“致良知”与“人皆可以为尧舜”的学说，路德对中世纪基督教神学进行改革，使神学世俗化，提出了“因信称义”与“人人皆僧侣”的学说；王阳明把由外在天理支配的人变为由内在心理——伦理自觉支配的人，把他律的理学变为自律的心学，完成了人与天理的和解，同样，路德把抹杀个人的他律宗教变为肯定个人的自律宗教，完成了人与上帝的和解。他们的学说都促进了人的发现，引起了思想文化领域里的深刻革命，在东西方思想文化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马克思说：“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决定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阳明心学因适应了明代中后期人们厌弃程朱理学，寻求思想变革的社会心理。故其产生后很快便风行天下。顾炎武称：“自弘治、正德之际，天下之士，厌常喜新，风气之变，已有其所从来。而文成（阳明）以绝世之姿，唱其新说，鼓动海内。嘉靖以后，从王氏而诋朱子者始接踵于人间。”（《日知录》卷十八）这种厌弃程朱理学，诋毁朱熹的社会心理在《二刻拍案惊奇》卷十三《硬勘案大儒争闲气》中得到真实反映。小说中的朱熹已失去了其作为圣贤的光环，变为一个虚伪残忍的假道学，他挟私愤，“酷逼娼流，妄污职官”，遭人

唾骂，而被他诬打的妓女严蕊却品格高尚，被作者赞为“是真正讲得道学的”。书中的正直人士唐仲友“极轻薄的是朱晦庵，道他字也不识的”。把朱熹及其理学嘲弄得淋漓尽致。若非是在晚明那种厌弃朱学，思想解放的时代，很难想象会出现这么大胆地褻渎圣贤的作品。

真正把王学社会化并导向“异端”的是以王艮为首的泰州学派。泰州学派的主要成员多出身于市井，王艮是盐工，韩贞出身陶工，朱恕是樵夫，林春为佣工。就是象何心隐那样本来“家世饶财”的人，也弃置家事家产，一心求道，甘与下层百姓为伍。泰州学派是一个代表市民利益与思想的学派，他们把王阳明的“人皆可为圣人”的命题进一步扩大发挥，使之世俗化，提出了“百姓日用即道”的观点。在此基础上他们反对程朱理学的禁欲主义教条，肯定人的物质欲望存在的合理性，颜钧、何心隐公开倡导功利主义的人生观，认为声色货利是与生俱来的人生本能，是人生命意志的体现，“性而味，性而声，性而安佚，性也，乘乎乎其欲者也，而命为之御焉”。（《何心隐集》卷二）泰州学派的思想言行反映了当时正在兴起的市民阶层的利益愿望，受到市民阶层的欢迎，特别是其主要成员身体力行，言传身教，将阳明的“良知”之学转化为一个社会化的启蒙运动。如韩贞讲学“以化欲为任，随机指点。农工商贾从之游者千余”。（《明儒学案·泰州学案》）罗汝秀讲学，听而从者有“牧童樵竖，钓老渔翁，市井少年；公门健将，行商坐贾，织妇耕夫，窃屨名儒，衣冠大盗”。（《焚书》卷三）泰州学派的出现成为晚明启蒙思潮兴起的标志，对程朱理学及传统礼教起到了很大的破坏作用，正如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所说的，阳明心学发展到颜钧、何

心隐迹人，则是协顺天地，“非名教之所能羁络”。

据晚明启蒙思潮能向此溯，最终肇始于学向人文主义转变的是李贽。李贽以思想家的睿智与勇气，推翻千古之是非，倡倒一统之豪杰，提倡“童心”，张揭“私欲”，对理学禁欲主义与假道学展开无情无情的抨击。他说：“夫私心者，人之心也。人必有私而后其心为见。若见私则人心私矣”（《藏书》卷四《论史表周臣中》）。宋明理学无视人的基本需求而将“存天理，去人欲”作为一种普遍道德原则强加于人，李贽一针见血地指出这种道德原则的欺瞒性，充分肯定了人欲存在的合理性。他的《童心说》是一篇关于人性的宣言，他倡导的绝假纯真的童心，是与“天理”相对立的不受世俗礼法沾染的真心，是建立新人性的核心。肯定人的感性欲望，重视人的个体价值，是晚明启蒙思潮的重要内容。汤显祖说：“天地之性人为贵，人反自贱者，何也？故大人之学起于知生，知生则知自贵”。（《汤显祖诗文集》卷37《贵生书院说》）贵生贵己，把人的价值放在首位，正是人自我意识觉醒的表现。继李贽之后，肯定人欲、反对虐杀人性的理学，成为晚期启蒙思想运动的普遍呼声。如袁宏道主张“理在情内”，反对“缚人性以为理”，袁宗道在肯定人欲的基础上提出“不离情欲而证天理”的见解，朱健提出“併情附欲”“徇私快欲”的学说，王夫之认为“随处见人欲，即随见天理”，把天理完全消融在人欲之中。这些思想的出现标志着人性正在摆脱中世纪理学的桎梏而向自我本体复归。

晚期思想家崇尚自然活泼的人性，弘扬人情的力量，形成以情反理的时代精神。李贽一反传统儒学“发于情，止乎礼义”的原则，倡扬自然人性，称“盖声色之来，发乎性情，

由于自然，是可以牵合矫强而致乎？故自然发于性情，则自然止乎礼义，非性情之外复有礼义可止也”。（《焚书》卷三）以人的自然之性取代了“礼义”这一普遍的道德原则。袁黄则把情凌驾于理之上，指出“人生于情，理生于人，理原来未尝远于情也”。（《西行斋集》卷一）僧达观干脆将情与理对立起来，说：“情有者理必无，理有者情必无，”指出情与理水火不相容的对立关系。汤显祖称“第云理之所必无，安知情之所必有邪！”（《牡丹亭题辞》）弃理扬情，反对理学禁欲主义，他的《牡丹亭》就是晚明文坛上一面以情反理的旗帜。冯梦龙公开倡导情教，他说：“世儒但知理为情之范，孰知情为理之维乎”。（《情史》卷一）他强调情的力量，欲以情教化人心，改造社会，为此他还特意编了一部《情史》，“三言”也是他情教的产品。

晚明思想家抨击礼教对人性的束缚，以人为本体对人性、人情、人的内心世界进行探索，从而发现了人的价值及尊严，产生了新的人格追求与个性自由论。提倡率性而为的真人，反对矫虚的人格，使晚明产生了一大批狂人奇士，如徐渭“疏纵不为儒缚”，狂侠豪宕，李贽自称“异端”，狂狷不羁，袁宏道率性而为，放达任情，他如何心隐之侠，王艮之怪，卢楠之豪，钟惺之僻，王思任之谑等，他们虽性格迥异，然皆是不为礼法所拘的狂狷之士，共同表现出对个性自由的追求。“三言”“二拍”通过文学形象称颂了这种狂狷人格，如笑傲王侯，“天子来呼不上船”的李白（警卷9），绝意功名，纵情享乐的卢楠（醒29），放荡风流，任情而使的唐寅（警26），嘲风弄月，甘当白衣卿相的柳永（喻12），这些文学人物的共同特征是：反对礼法束缚，蔑视权威，追求自由的个性，维

护人的尊严，他们的行为与晚期的“狂人”们如出一辙，在他们身上映照着晚期个性解放的精神，冯梦龙、凌濛初把自己对时代精神的感受融进文学创作，通过生动的文学形象的塑造，反映出晚期启蒙思潮的实绩。

市民意识的觉醒

时代思想的变异与社会政治经济、生活观念的变化密切相联，晚期启蒙思潮是与经济领域里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以及市民主体意识的觉醒同步进行相互渗透的。王阳明哲学是市民哲学的先导，泰州学派是市民哲学的代表，李贽等“异端”思想家是市民思想的代言人，他们具有近代色彩的启蒙思想是觉醒了的市民意识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反映，他们的个性追求反映出市民阶层要求摆脱封建礼教束缚的愿望。但作为领导时代潮流的文人，他们的思想行为只是市民意识觉醒的一个侧面，而晚明市民意识的觉醒更广泛地反映于下层市民生活方式与人生价值观的变化，这种变化是以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与市民阶层的壮大为前提的。

马克思说：“世界商业与世界市场是在十六世纪开始资本的近代生活史的。”（《资本论》卷一）中国十六世纪的情景也是如此。在明代正德年间，就开始出现资本主义萌芽，至嘉靖万历年间，资本主义萌芽已有较大的发展。在当时的长江三角洲及江、浙等地，城市规模迅速扩大，商人、手工业者、雇工及城市小市民的数量猛增，据《吴江县志》载，吴江县在成化时仅有四镇三市（集市），到嘉靖时则增至四镇七市。震泽镇在成化时只有三四百人家，至嘉靖则发展到近千